

Dec. 1
2021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21年第6期 (总第18期)

全球治理中的 叙事与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IWEPI)

本期执笔

苏山岳 张尊月 闵世欣
孟思宇 杨嘉豪



专题序言

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叙事能力和话语权,有助于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是当前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期学科动态以全球治理中的叙事与话语权为主题,探讨了中国“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叙事逻辑与成效;阐述了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表现与来源;并尝试对日趋增加的数字虚假信息进行理论分析。

本期目录

1. Yi Edward Yang, “China’s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0, No. 128, 2021.
2. Carolijn van Noort, “Strategic Narratives, Visuality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ase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3, No. 5, 2020.
3. Seng In Chan and Weiqing Song, “Telling the China Story Well: A Discursive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 No. 3, 2020.
4. Fu Chen and Guofeng Wang, “A War or Merely Friction? Examining News Reports on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Disput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China Dail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forthcoming.
5. Yunhan Zhang and Jan Orbie,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China’s Climate Policy: Analysing Three Phases in China’s Discourse Coalition,” *Pacific Review*, Vol. 34, No. 1, 2021.
6. Christina la Cour, “Theorising Digital Disin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4, 2020.
7. 马荣久:《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国际展望》,2021年第4期。

本期审校

陈兆源、孙振民



No. 1

Yi Edward Ya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0, No. 128, 2021

**“China’s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under Xi Jinping”**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战略叙事：新时代的改革》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塑造“中国式”的全球叙事。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还为这种叙事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即试图运用话语权，特别是通过制定和推动战略叙事来塑造国际体系。本文提出了一个解释这一战略的理论框架，考察中国通过加强其话语权来重塑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努力。

首先，作者介绍了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构想，引出研究的背景，并提出了本文的两个研究问题：

- 1) 中国为何强调话语权作为实现其全球治理改革雄心的手段？
- 2) 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中如何运用战略叙事？

其次，作者在中国外交政策背景下梳理了关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文献，说明研究的意义。作者指出，正如建构主义学者所主张的，国家身份和国际秩序是通过话语建构的，因而话语权与全球领导力联系在一起。

接着，作者介绍了战略叙事框架和社会认同理论（SIT），引出研究的机制。作者首先指出，“战略叙事是政治行为者扩大影响力、管理期望的有效工具”。而后，作者运用 SIT 理论讨论了中国为支持其领导全球治理改革而制定和推动的战



略叙事，认为中国可能通过加入精英俱乐部、试图成为领导国家中的佼佼者，或在地缘政治竞争领域之外追求卓越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

随后，作者通过四个简短的案例研究说明上述理论框架的解释力。首先是习近平主席执政时期中国国际体系层面的战略叙事，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是中国近期在气候变化、人权和互联网治理等三个议题领域的战略叙事，以说明社会流动性、社会创造力和社会竞争这三种叙事策略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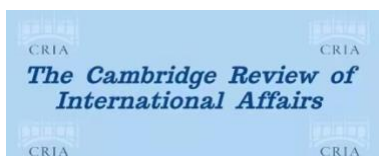
本文的结论是，在渴望大国地位的驱动下，中国政府正采用一种多元叙事策略影响现有规范，并在不同的全球治理领域创建新的规范。然而，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是复杂且微妙的，会根据现有规范的属性和中国自身的利益而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存在差异。因此，可以将 SIT 理论和战略叙事结合，以之检验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崛起中大国的行为。本文还强调同一行动者（一个国家或团体）可能在议题领域中组合各种地位寻求策略，为 SIT 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此外，作者还对后续研究做出了展望：

- 1) 案例的选择是为了说明理论框架的逻辑，即中国的战略叙事策略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不同的治理领域存在差异。未来的研究应该对叙事进行有效和严格的测量；
- 2) 本文提出的每一个案例都可以扩展为独立的研究，详细分析驱动战略叙事的（国内和/或国际）因果机制；
- 3) 关注与战略叙事相关的结果也很重要，比如，叙事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如何衡量叙事的有效性？什么因素解释了叙事的成败？

编译：苏山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2**Carolijn van Noort***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33, No. 5, 2020**

**“Strategic Narratives, Visuality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ase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数字时代的战略叙事、视觉语言和基础设施：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例》

数字时代，政治精英广泛使用媒体工具开展战略叙事，影响其目标受众的行为。他们采用口述的形式，如演讲或采访，也采用书面的形式，如报道或图像。

“阿布格莱布酷刑和虐囚”照片、圣战视频等都证明了视觉传播的重要性。其实，视觉的战略叙事视角不仅可被用于研究战争、冲突、灾难，同样也可被用来研究和平的主题，比如基础设施。

本文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例，选取中国“一带一路”门户网站上的 19 张静止图像样本，展示了中国如何传播图像来支持基础设施相关的战略叙事，又是如何通过图像对国家自身进行叙事。

在理论部分，本文首先考察了将“战略叙事”、“视觉语言”和“基础设施”三者相联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

- 1) 本体论部分的逻辑框架遵循战略叙事传播的过程：形成、投射和接收。作者分别从支持基础设施战略叙事的图像是什么样、由谁在传播、在哪里传播以及为什么传播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2) 方法论部分, 作者指出需要从社会(围绕基础设施项目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实践)、技术(镜头角度)和组合(图像本身的内容)三个模块对视觉图像进行研究, 并应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基础设施的战略叙事效果, 包括受众访谈、话语分析、内容分析、视觉启发(在访谈中使用图像来激发反应)等。

那么图像究竟如何赋予基础设施战略叙事以意义? 作者指出, 图像之所以被应用于战略叙事,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 1) 图像可以改变信息范围、提供额外的信息层并提供信息呈现的替代形式。比如, 框架图、结构图等呈现了“一带一路”取得的多项成就, 并将信息范围从基础设施扩展到了国际合作;
- 2) 图像体现了一种或多种叙事功能。通过交互式图表阐释中国基础设施愿景和行动计划, 可以额外提供规范、价值和原则等更多信息;
- 3) 视觉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可以唤起记忆。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建立在传播一个新丝绸之路上, 从而唤起了人们对古丝绸之路的记忆。

本文的创新在于关注到了战略叙事中的视觉语言, 并将其应用于基础设施领域, 提出了适用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不过, 海上丝绸之路的案例分析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本研究选取的视觉图像来源于单一时点、单一网站, 且并不能将作为研究对象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整体的视觉图像精准区分。此外, 作者也指出, 基础设施图像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因果机制难以考证, 只能在和基础设施战略叙事相关的图像与国际政治之间构建关系, 但本文由于仅选取了单一时间点, 因此也未能对图像及其战略叙事的结果进行动态分析。

编译: 张尊月(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



No. 3



Seng In Chan and Weiqing Song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 No. 3, 2020

**“Telling the China Story Well:
A Discursive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讲好中国故事：“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外交政策的话语分析》

本文采用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PDA）构建了一个分析“一带一路”倡议话语的框架。该框架包括两部分：话语产生分析与外交政策分析。前者侧重话语者的领域、立场和策略，后者主要分析话语如何“创造有意义世界的符号资源”。分析围绕“一带一路”主流话语的两大主题——发展和地缘政治——展开。中国有关“一带一路”的外交政策官方文本和准官方文本是话语分析的主要对象。

作者首先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发展话语。“一带一路”倡议被表述为中国与各国寻求共同发展、构建相互依存的和平网络，而非谋求某种政治影响范围，这一目标主要通过广泛领域推进互联互通来实现。此外，这种话语实践常援引全球政治经济的既定规范语言，如“全球公共产品”、“包容性全球化”。因此，中国的话语实践是有目的地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在全球共赢发展原则的指导之下进行的。这种“去政治化”的话语战略可以体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红利”的善意投射，重构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话语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话语与外交政策的联系机制是“问题化”：话语实践可以将“错误”元素及相应的“纠正”元素暴露出来。



“一带一路”话语中反复出现的叙事是，“一带一路”是中国对现有全球发展议程的“纠正”。这种叙事首先涉及经济批判，即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无法应对时代挑战，也涉及政治批评，即现行国际秩序中制度性权力分配不公，以及西方对全球发展议程的普遍干预。“一带一路”话语实践中对发展的问题化指向西方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不良影响。在中国的话语中，“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在发展话语中发挥解决问题的作用。

作者之后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地缘政治话语的“去安全化”。作者认为，在中国周边，将“邻里”纳入“一带一路”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的地缘政治存在。为推动地缘政治去安全化，中国强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各国互联互通、建立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的重要性，如“五通”和“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中国的“一带一路”话语实践的另一个独特主题是构建政治行动所依据的地缘政治“知识”，通过丰富地缘情节，将“一带一路”倡议置于“包容性”地缘政治中，将“一带一路”表述为“自然的”、“有益的”和“必要的”来表达中国的战略关切。

作者给出的结论是，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试图将国际受众纳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发展话语和地缘政治话语组成，并导向话语—外交政策的联系，使某些外交政策实践变得“可能”。本文的话语分析有利于增进对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特别是优先事项、重点领域和后续可能的影响。本文受后结构主义启发，脱离了功利主义和传统框架的桎梏，分析了发展与地缘政治这两个关键概念在话语领域的特殊意义，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话语—外交政策关系做出了贡献。

编译：闵世欣（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No. 4



Fu Chen and Guofeng Wang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forthcoming

“A War or Merely Friction?”

**Examining News Reports on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Disput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China Daily*”**

《一场战争或仅是摩擦？对〈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

关于当前中美贸易争端新闻报道的审视》

2018 年以来，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间的贸易争端一直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语料库辅助语篇研究的方法，借助语料库检索、关键词分析等技术比较《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两大主流英文媒体对此事的解读，揭示语言使用与意识形态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两报在描绘中美贸易争端时使用的语言模式异同，并以此对比两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首先，作者详细介绍了发端于 2018 年的中美贸易冲突，引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其次，作者从批判话语学的角度指出“意识形态植根于新闻话语的语言模式中”，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理论机制：通过分析特定的语言模式（即比较不同国家新闻机构关于同一事件的报道），并解释在语篇中出现（或没有出现）特定语言模式的原因，可以呈现出新闻语篇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作者还提出了本文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 1) 《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在描绘这场争端时分别关注哪些方面？
- 2) 两家媒体采用何种语言模式来描绘中美贸易争端，以符合各自的社会政治关切？



接着，作者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本文数据取自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上发表的相关新闻报道，这段时间见证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开端和初步进展。其中，有 450 篇文章取自于《纽约时报》，另外 485 篇文章则取自于《中国日报》。本文采用语料库辅助语篇研究法（CADS），使用语料库程序获取两份报纸的关键词列表，并对这些关键词的一致性进行人工分析。

研究表明，《纽约时报》倾向于认同将中国视为对美国“潜在威胁”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将贸易冲突描绘为“战争”；而《中国日报》则缓和语气，并倾向于将事件定义为“摩擦”，这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务实民族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两家报纸运用各自的叙事手法，诉诸不同的语言模式，对问题的原因、道德评价/后果和处理进行了建构。这些差异可以由双方的基本理念和国家利益来解释：二者的叙事都试图将其母国采取的行动合法化，以保护和促进各自的国家利益。

编译：苏山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5

THE
PACIFIC
REVIEW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Yunhan Zhang and Jan Orbi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4, No. 1, 2021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China’s Climate Policy:
Analysing Three Phases in China’s Discourse Coalition”**

《中国气候政策的战略叙事：分析中国话语联盟的三个阶段》

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扮演的角色不断发生转变。本文从系统和国家层面对中国气候政策的战略叙事进行全面研究，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将战略叙事理论与中国话语特征相结合，考察了由政府、知识共同体和官方媒体组成的中国气候“话语联盟”。作者认为，在制度层面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严格划分已经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所取代；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不再自称“生态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是接过了气候问题治理的“火炬”。

作者首先指出，对于中国气候政策的既有研究关注政策本身，而不是战略叙事的运作模式。针对国际关系研究大环境中的“叙事”转向，需要对中国的气候政策建立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作者假定，战略叙事塑造了社会对世界现实的看法，而非仅仅反映世界现实。因此，叙事被定义为将符号、代码和事件按照连贯的顺序进行排序、结构化或组织。

以此为基础，作者对中国的气候叙事进行理论观察。结构性战略叙事是行动者为生成、维持和改变国际秩序而进行的话语尝试，包括系统叙事和国家叙事。以此为基础，作者提出了中国特色的三位一体“话语联盟”的理论框架：

- 1) 最高领导人提出战略叙事，提供政治推动力；



2) 知识共同体为领导人的战略叙事填补实质性内容，避免对外政策的战略模糊，将抽象的战略概念转化为清晰的战略蓝图；

3) 中国媒体沟通全球受众，促进建立积极的中国形象，并建立气候战略的合法性。

作者认为，从 2009 年到 2018 年，中国气候政策战略叙事经历了三个阶段：

1) 从哥本哈根大会到德班大会（2009-2011）。中国在系统层面上的叙事意图是将国际气候谈判保持在两条轨道上，从而推迟减排承诺的最后期限。在国家层面上，中国更多的将自身描绘成生态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2) 从德班气候大会到巴黎气候大会（2011-2015）。除了受到国际压力，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污染问题愈发严重，低排放技术成为经济“新常态”等。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更新了战略叙事，开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指出世界各国应共同承担气候治理责任。这标志着中国从以发展水平划分国家责任向推动多极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开始更多作为“负责任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气候机制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3) 巴黎气候大会至今。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国重申针对气候变化开展多边合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张。

本文探讨了中国对于国际气候体系的作用和意义。战略叙事的理论框架使我们能够超越通常现实主义对战略理性计算的关注，对中国国内和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分析中国气候政策的战略叙事，本文为观察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气候治理领域形成并投射影响力提供了关键案例。

编译：孟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6



Christina la Cou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4, 2020

“Theorising Digital Disin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关系中数字虚假信息的理论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现代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特征——数字虚假信息。数字虚假信息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数字虚假信息是传统的宣传手段还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手段。作者在文中探讨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分析以及如何解释现代数字虚假信息在国际关系中的使用。

文章首先指出，虚假信息在国际关系中是有特殊含义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在概念上有别于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一词最初特指为了造成伤害而设计出来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出去的虚假内容。在本文中，虚假信息的范围被限制在以国家行为体作为散布虚假信息主体的种类中，主要是有以下三种：

- 1) “虚假信息报道”是由外国信息部门制造的单个错误（新闻）报道；
- 2) “虚假信息运动”是由外国散布与特定事件有关的多个虚假故事。它们通常是为了导致有关事件更加混乱；
- 3) “虚假信息活动”是一种长期的、系统性地欺骗外国群众的活动。在长期运营中，并非所有信息都是虚假的，信息的真假掺和可以实现更高级的传播、实现信息背后行为体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



作者认为，在分析数字虚假信息时主要专注于三个方面：一是虚假信息的促进者，即如何将一个虚假信息传播出去；二是虚假信息的使用，即何人何时以及如何传播虚假信息；三是对虚假信息的反应，即何人何时以及如何对虚假信息做出反应。作者随后以爱德华·卡尔、约翰·米尔斯海默、约瑟夫·奈的理论对数字虚假信息进行理解和分析。

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中提到的舆论宣传有四个关键特征：一是宣传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情感、想法等精神元素。在现在的国际数字虚假信息中，意识形态往往被隐藏在深处，主要是通过使特定的群体共情实现传播者想要造成的效果。二是宣传的故事或信息真真假假。这个特点可以在现在的数字虚假信息中看到，通过特殊的角度进行描述可以在讲真话的同时歪曲事实。三是宣传的目标要么是增加对国内政策的支持或者改变政策，要么是改变敌国或中立国的政策。这也符合现在的国际数字虚假信息通过传播不实信息来影响外国政策的特征。四是宣传是与权力有联系的。现在各国主要通过代理人实现对他国传播虚假信息，尽可能避免自身暴露在事件中。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揭示了跨国谎言背后的特殊动机，但当今的国际数字虚假信息并不能简单地被并入其所提出的七种谎言类型。米尔斯海默提出，一个领导者更倾向于为了自身利益对国内群众说谎，这和现在国际上大规模的数字虚假信息也是不符的。但是，米尔斯海默重点分析了撒谎这一行为的目的性，即一个人说出其知道是不正确的信息，这能比卡尔的宣传观点更好地概括现代数字虚假信息的倾向性。

在奈的理论中，公共外交优于宣传手段，宣传作为一种单向的沟通方式往往缺乏公信力。公共外交的一个特点就是影响他国舆论，虚假信息不仅可以在短期



内影响一个国家的舆论环境，而且长期内也会打击一个国家主流媒体的可信度。奈的理论专注于如何利用公共外交来增强一国的软实力，但很少关注受到软实力冲击的一方如何防范。

以上三位学者的理论都对虚假信息背后的动机做出了部分解释。在奈和卡尔看来，虚假信息只会损害发布者的可信度，但就现代国际数字虚假信息而言，我们很难追踪到发布者，也很难保证真相总会浮出水面。此外，发布者的信誉是否受损可能并不重要，在媒体的快速传播能力下，真相大白之日也是新闻媒体信誉扫地之日，但发布者如果打击了一国媒体的可信度，其政治目的也就实现了。总之，本文肯定前人的理论对分析现代国际数字虚假信息所做的贡献，但是也承认，现有理论依旧难以解释和分析为什么如今各种行为体使用虚假信息，以及国际政治中出现的虚假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等问题。

编译：杨嘉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7



马荣久

《国际展望》2021 年第 4 期

《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

当代国际社会演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众多国际组织产生与发展，并对国际互动的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相关研究指出，全球性国际组织“为世界定规则”，地区性国际组织推动“建构安全共同体”。在世界秩序的形成及“再谈判”进程中，国际组织处于核心位置。本文以权力、结构性权力等相关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系统探讨国际组织中的权力分布，揭示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以制度性话语权为代表的结构性权力及其分布为理解当代国际秩序演进以及“权力转移”的未来图景提供了新的思路，弥补了仅从关系性权力视角认识这类问题的局限。

作者首先说明权力以及结构性权力的概念：权力是某行为体采取某种行动以影响另一个行为体的能力，这种能力会改变各种特定的未来事件的模式；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作者指出，一个国家日益提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它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对于国家而言，结构性权力是从根本上决定办事方法、影响事态走向的能力，是构造与其他行为体之间互动关系框架结构的能力。一系列覆盖不同互动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已成为结构性权力的重要载体，也是结构性权力在国家之间分配的主要平台。



作者指出，国际组织是一种“超越国家边界的正式安排”和“制度化机构”，有关各方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发挥影响力的程度并不是均等的。国际组织中不同参与方的角色和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 1) 制度设计。制度赋予参与者以正式权力，并为其提供获取组织资源与信息的特权通道。制度由此锁定政治权力分配，历史上的赢家可以通过制度化来保持其初始优势；
- 2) 议程设置。一个国家通过采取措施使自己偏好的议题得到充分考虑、有机会成为各方在制度框架下合作的基点，进而推动确立行动的方向和建立可接受的行动界限；
- 3) 理念导向。作为集体行动中理念的提出者、倡议者、引领者，相关国家有机会更有效地发挥影响力。谁的观念占据主流地位，谁就在事实上决定行动的方向。

作者随后探讨了国家行为体制度性话语权的来源。一方面是国家实力因素，包括基于物质资源的国家相对实力、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国家相对实力、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国家相对实力；另一方面是多边外交建设能力。国际组织中的人员配置、谈判人员的素质与一个国家在双边外交中的谈判权、领导力密切相关。国家行为体应立足长远，放眼未来，争取成为制度框架的构建者、议程的设置者、理念的倡导者。

作者最后指出，以国际组织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与国际社会的密切互动中，赢得结构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外交的关键指向。首先，中国应在制度谈判进程中团结新兴国家，携手发展中国家，积极提升包括自身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其次，中国应深入参与和积极构建地区多边制度框架，引领制度框架下的议程设置，倡导与传播共享理念；再有，中国应切实增强多边外交能力，注重多边外交舞台上的语言传播能力、制度谈判能力、人员配置能力，始终保持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



性和角色实践的主动性，从而将以物质资源衡量的潜力和实力有效转化为以塑造其他行为体预期和行为来衡量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编辑：杨嘉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声明：对观点的摘录和引用不代表编者本人及其所属单位对观点的认同。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 琳 熊爱宗 鲁 桐 吴国鼎
陈兆源 黄宇韬 韩永辉 宋 锦
刘 玮 沈 陈 田 旭 彭 博

研究助理团队

兰馨彤 苏山岳 孟思宇 杨嘉豪 孙振民

